

徑。在其看來，正義並非一定依賴於程式化的國家司法模式運作，如果將回應性的、共和主義的價值觀提升到憲法價值層面，並將其注入到社會正義的實踐之中，或許能夠更好地滿足規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需求。

可以說，布雷斯維特的《規制資本主義》是其一系列前期研究的系統性的升華。從其《回應型規制》到《恢復型司法與公民社會》(*Restorative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再到這本《規制資本主義》，布雷斯維特的關注點一直不曾動移，那就

是解析除卻國家層面上的規制權，公民社會與個人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能動的規制功能。從其諸多作品中，不難看出塞爾茲尼克回應法理論的影響，布雷斯維特同樣不滿形式法治主義的弊端，重視法治與公共治理的回應性需求。他不僅意圖破解國家主義的神話，而且宣揚了公民與社會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動性。總之，《規制資本主義》汲取了法學、經濟學、社會政治理論的諸多睿識，並佐以大量的實證材料，必將會給規制學界帶來新的思想火花與智識衝擊。

政權易手與領袖命運

● 蔣寶麟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是研究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的重要學者，在台灣史學界以熟拈檔案、精於史料考辨而著稱。劉氏新著《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以下簡稱《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引用只註頁碼)，畢作者十年之功而成，專論

近幾年以來，蔣介石研究已成為海峽兩岸乃至海外學界的研究熱點，這得益於蔣介石史料的開放。《蔣中正的一九四九》一書，即以「蔣檔」和蔣介石日記為史料根基，輔之以相關檔案和其他人物日記。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雖敘述1949年，但又不僅停留在1949年。問題前後貫通，是該書的一大特色。此外，該書十分注意蔣檔和蔣日記的比對，書中許多細節往往同時參閱此二種史料，並注意彼此差別。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之際蔣介石的個人出處(劉著內文稱「蔣中正」[名]而非「蔣介石」[字]，本文姑且從眾而稱「蔣介石」)，並由此揭示中國軍政格局的徹底轉折和國民黨內爭之複雜情勢。該書論述脈絡精審、史實爬梳考辨細膩，可謂蔣介石研究的力作，值得業內充分重視。

近幾年以來，蔣介石研究已成為海峽兩岸乃至海外學界的研究熱點。特別在中國大陸，包括蔣介石研究在內的民國史和國民黨史已從昔日之「險學」而漸變為「顯學」。這一方面與兩岸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有緊密的牽連，另一方面更得益於蔣介石史料的開放，特別是1990年代末台灣國史館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又稱「大溪檔案」，簡稱「蔣檔」)，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從2006年起逐步開放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簡稱「蔣日記」)。《蔣中正的一九四九》一書，即以蔣檔和蔣日記為史料根基，輔之以國史館和國民黨黨史館藏各種相關檔案和其他人物日記。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蔣家將蔣日記交由胡佛研究所暫時保存之前，劉維開因參與「《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續編計劃」，並負責抄錄整理相關材料，得以系統查閱1949年的蔣日記原稿。筆者不太知曉胡佛研究所製作並開放縮微膠捲之前蔣日記的學術利用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劉氏是最早利用蔣日記並進行嚴謹學術研究的少數歷史學者之一，此為《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含前期研究)推出的重要條件。而且據筆者所知，劉氏長年研讀蔣檔和數量龐大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原檔，對於相關事實了然於胸，運

用史料則能信手拈來。《蔣中正的一九四九》雖敘述1949年，但又不僅停留在1949年。問題前後貫通，是該書的一大特色。

目前學界存在一種傾向，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有愈來愈多的人前往美國查閱蔣日記，但近幾年發表的有創見的論著並不是很多，這與許多新加入學者的前期準備不足有關。所謂「蔣介石史料」本是整體，且彼此間存在許多史實和邏輯的關聯。如果單純從某些材料入手而確定研究題目，出手太快，有時可能會拿捏不準。況且，從某種角度而言，蔣檔較之蔣日記更具基礎性。針對蔣日記，若單刀直入進行研究，未必就能立竿見影。相形之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十分注意蔣檔和蔣日記的比對，書中許多細節往往同時參閱此二種史料，並注意彼此差別。如1949年11月14日蔣檔之《事略稿本》收入「此次飛渝……故能無憂無懼耳」條，與蔣日記對勘，作者發現其中有個別文句進行了刪改(頁240)。其他不一而足處，非經長期研讀各類相關史料無以致，這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史料功底和嚴謹的治史態度。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一書以時間為經，分五章敘述，基本涵蓋了1949年蔣介石的個人出處，以及由此引發的國內和黨內的政治劇變。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主角之一是蔣介石，但另一個主角不是敵手毛澤東或中共，而是李宗仁。作者似乎告訴我們，改變1949年中國命運的是國共關係，而兩岸分途雖致使蔣介石迫赴台灣，但決定蔣個人能在台灣重返權力巔峰的則是國民黨內部的因素。

第一章「第三次下野」。作者詳述蔣介石1949年1月底宣布下野的來龍去脈。蔣介石於1948年5月20日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但是由於國共內戰局勢的逆轉，南京政府和國民黨內部的政治板塊發生變動，1948年底起，蔣氏的總統地位就開始發生動搖。作者認為，蔣介石下野固然有美國方面的因素，但是影響不大。而副總統李宗仁領導的桂系在國軍戰事不利的情況下進行「逼宮」，並聯合政府內部主和派對蔣介石形成政治壓力，才是蔣下野的重要原因。

關於以上兩點，既存研究也一般多將此作為蔣介石「被迫」下野的原因。不過，作者利用蔣日記材料，認為對於中國國民黨和黨員的失望才是蔣介石下野的主因。這一點是該書的重要發現，與一般論點不盡相同。其實，這恰與一年前蔣介石競選總統及其後的心路歷程有相當關聯。作者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臨時中全會之研究(1948.4.4-4.6)〉(《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頁74-90)一文中對蔣介石不欲競選總統的問題有過詳細的討論，可以參照閱讀。而且，蔣氏以多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主觀上判斷和談不可能成功，「值此時會，我深明個人的負擔和責任，我決不會如外間所揣測，避到台灣去，我一定得在大陸上建立反共的陣營與敵人作殊死戰！」(頁62)，這也說明蔣介石雖「下野」，但他決不會輕易置身事外，隨時會「重起爐灶」(頁63)。

在本章的最後一節，作者特別關注到蔣下野之後，副總統李宗仁究竟是「繼任總統」或「代行總統職

權」的問題。若蔣氏辭去總統之職，根據憲法相關規定，由副總統李宗仁繼任；但如果蔣「引退」(因故不能視事)，則「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頁66)。蔣介石在政治上老謀深算，又有與桂系周旋爭鬥的二十餘年經驗，自然極為通曉此中奧妙。最後在國民黨各方的協調下，李宗仁只以「代總統」的身份繼蔣而出，但這也為今後蔣、李的決裂埋下一顆定時炸彈。

第二章「從溪口到台北」。蔣介石下野後，翌日即飛離南京，從杭州和寧波返鄉。蔣氏此次在溪口居住共計九十四天，除了「遊山玩水」之外，始終沒有疏離黨政核心事務。雖然下野，但蔣並未辭去國民黨總裁一職。就此而言，蔣介石與代總統李宗仁的政治關係具有不確定性。在蔣下野後，李宗仁和白崇禧自然希望剪除蔣的政治影響力，迫其出洋，但蔣堅決不從。由於自身權力根基不穩，加之中共陳兵百萬於江岸，無論出於主動還是被迫，在大政方針上，李宗仁仍須請示蔣之意旨。而蔣介石認為李宗仁為國民黨員，執政須尊重黨紀。作為黨的總裁，蔣介石在鄉仍積極籌劃下一步政治策略。本章有一節題為「關心黨政事務」，對此筆者沒有異議。但若從此時蔣介石的國民黨總裁身份和實際的影響力而言，筆者想，這種「關心」本身就意味着「遙制」，他對於核心權力決不輕言放棄。作者利用蔣日記所言「五年打算」推測，蔣介石想在李宗仁代理總統五年期滿後競選第二任總統；若沒有機會，則繼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致力黨務改革(頁105)。

書中有一節題為「關心黨政事務」，但若從此時蔣介石的國民黨總裁身份和實際的影響力而言，這種「關心」本身就意味着「遙制」，他對於核心權力決不輕言放棄。作者推測蔣介石想在李宗仁代理總統期滿後競選第二任總統。

作者對於許多重大問題一般不作「歷史性」或「政治性」的價值判斷，多採「存而不論」的策略。不過，筆者從中讀出的信息是，蔣介石在1949年之中沒有片刻放棄過既得的政治權威。

第三章「建立黨政關係常軌」。本章三節，作者分別考察「杭州會談」、「非常委員會」和「閻錫山組閣」三個問題。1949年4月21日，國共北平和平談判破裂，解放軍渡江，南京局勢危急。次日，蔣介石與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群、吳忠信、王世杰和陶希聖等人在杭州舉行會談。會上蔣氏確定堅決反共到底的方針，李宗仁因和談失敗而請蔣復出，領導作戰。根據杭州會談的相關決議，國民黨中央成立非常委員會，以代替政治委員會職權，由蔣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此後重大決策，均須由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通過，然後交政府執行。作者認為，中央非常委員會的性質類似抗戰時期的國防最高委員會（頁167）。

5月30日，李宗仁批准何應欽辭去行政院院長一職。但是緊接着，李屬意的居正被立法院否決繼任行政院院長。無奈之下，李宗仁提名閻錫山繼任，獲立法院多數同意通過。作者結合立法院內的國民黨派系因素，認為CC派立委挺閻的主要目的是對付李，從而達到支援蔣的目的，但支援閻錫山組閣幕後的真正推手是蔣介石。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院長及其閣員人選，對於蔣介石權力的維持與鞏固有一定作用。

第四章「維護大陸最後據點」。本章述及1949年蔣介石兩度赴西南地區進行軍事和政治的部署。1949年8月23日，蔣介石自台北飛抵國府所在地廣州，隨即於次日轉往重慶。蔣氏在重慶停留一個月後又折回廣州，處理保衛廣州的部署，於10月3日返台北。10月13日，解放軍

攻克廣州，國府遷重慶。由於解放軍進攻西南，形勢危急，蔣介石復於11月14日抵重慶，策劃保衛西南事宜。同時，李宗仁在重慶危急之時，於11月20日以就醫為由，從南寧飛往香港，欲轉赴美國。11月29日，國府再遷成都辦公，次日蔣介石赴成都。12月10日，蔣介石自成都經海南島飛往台灣，從此永遠告別中國大陸。作者認為，李宗仁赴港，促使蔣介石重新回到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第五章「在台復行視事」。國府遷台而代總統李宗仁赴港再赴美不歸，造成蔣介石復職的良機。作者在本章中描述了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的詳細經過。其實，在1949年10月初，鑒於時局日益惡劣，李宗仁已萌生退意，擬請蔣介石復位，但未得蔣之首肯。但同時，李宗仁認為如果蔣不復職，則希望他放開一切權力。此後一段時間，蔣介石雖未主動提出復職問題，但是黨內的呼聲日益高漲。11月下旬李宗仁赴港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蔣介石復職已成水到渠成之勢。不過，由於時局關係和「代總統」的法律地位問題，蔣介石直到1950年3月才在台灣「復行視事」。

縱觀全書內容，作者將蔣介石的個人出處和時局變化的關係作了十分周延的考察。透過各類資料顯示，對於「下野」和「復行視事」，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蔣介石個人有着複雜的心路歷程。由於國共戰局的變動和黨內派系政治的因素，蔣介石對於總統職位的態度變動不居，並不能簡單以「戀棧」或「放棄」概括。在書中，作者對於許多重大問

題一般不作「歷史性」或「政治性」的價值判斷，多採「存而不論」的策略。不過，筆者從中讀出的信息是，對於政治「職位」是「拿得起」或是「放得下」，蔣介石在1949年之中沒有片刻放棄過既得的政治權威，這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亦具一貫性。

無論是「下野」還是之後的「復行視事」，李宗仁始終是蔣介石的「對手方」。對於李，作者同樣給予其足夠的「話語權」，書中的李宗仁並未失聲。與蔣介石相比，李宗仁對於總統「職位」的態度同樣複雜。他既企圖登臨權力巔峰，更希望徹底消除蔣介石政治影響力的束縛。然而，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但並非是個「太平皇帝」，李宗仁因「和談」而走向前台，自身的政治根本來就不穩，一旦和談失敗，他和桂系根本不足以支撐整個局面。可以說，李宗仁雖有全面負責之心，但無全面負責之力。對於是否請蔣復職更是心存矛盾。《李宗仁回憶錄》是他發聲的重要管道（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但一些未刊資料也呈現出他當時思想世界的另一面，作者兼而並用，更見全面和公允。1949年的蔣、李關係極為複雜，不僅影響中國的政局，也標誌着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派系政治的尾聲。黨內派系之爭之於「1949」這一特殊的歷史符號的意義，頗耐人尋味。

該書第三章題為「建立黨政關係常軌」，作者意欲說明的是：蔣介石下野前同時為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總裁，黨政之間維持着良好的關係；下野之後，李宗仁雖為代

總統，但在黨內並非權力核心，黨政關係出現變化。為了協調黨政關係，蔣介石居鄉期間思考重新建立黨政關係，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雖然作者也在書中特別點明「行憲」前後黨政關係的差別，但是否將類似於「訓政」時期的非常委員會體制算作是黨政關係的「常軌」，筆者認為措辭上可能還需斟酌。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所謂的「常軌」體制一直延續到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之際。

總的來說，本書以作者歷年發表之相關論文為基礎而成，結集時又做過較大幅度的增補與修正，受眾讀之，能感覺到書中十分清晰和連貫的線索。不過，細細品味，發現書中有些地方可能仍可打磨，俾其更像「專著」一點。如頁197，論及李宗仁〈談話記錄〉，作者對此進行長篇註釋，不免和第二章第三節內容有重複，可以省去。

最後，書中某些部分似乎可做修正。頁47所引毛澤東〈關於時局的聲明〉，第4行「接受」應為「接收」。頁80第二段「寧波」改為「鄞縣」更妥。蓋明初設寧波府，府治在鄞縣縣城，長期延續。1927年北伐軍攻克鄞縣後，鄞縣縣城改設寧波市。1931年，寧波市併入鄞縣。而且本書所引阿育王寺、天童寺等更不在縣城，所以用「寧波」不妥（在1949年前，世人眼中的「寧波」有兩重含義：寧波包括鄞縣、奉化、鎮海、慈溪和定海各縣；而在當地人看來，鄞縣縣城的六門之內才算「寧波」）。此外，頁23之註34、35，頁186之註92，句號有衍出。頁54之註113，第八點應為圓括弧。

1949年的蔣、李關係極為複雜，不僅影響中國的政局，也標誌着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派系政治的尾聲。黨內派系之爭之於「1949」這一特殊的歷史符號的意義，頗耐人尋味。